第16卷第2期 杭州大学学报 Vol.16, No.2
1986年6月 JOURNAL OF HANGZHOU UNIVERSITY June 1986

范成大与其纪游日录*

〔美〕何 瞻
(JAMES M. HARGETT)

一、前 言

在中国古籍中，有一种散文性体裁叫做“游记”，或称之为“纪行”。一提及此类作品，极易使人忆及唐代柳宗元（773—819）的《永州八记》，或南宋陆游（1125—1210)的《入蜀记》。而传统中国最有名的旅行家，可能是明末的徐宏祖(1586—1641)。他撰写的旅行日记——即后人所辑的《徐霞客游记》——不但是一部具有创造性和科学价值的地理考察佳作，而且是一部优美的文学创作。除了上述作品之外，古代中国还传下来了不少其它的游记。于此不胜枚举。这些游记虽然多半是闻名于后世，但是实际上所谓游记到底是如何的一种散文体裁？它究竟有什么特性？似乎至今仍少有学者仔细地研究过。

据笔者所了解，传统中国的游记一般说来有三个特性：（一）是作者亲身游历的记录；（二）有对山水及其他物象的客观记叙；（三）表现作者的主观感受①。

游记在中国有很长的历史，最早大约始于魏晋时代。慧远（334—416）的《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鲍照（约412—466）的《登大雷岸与妹书》、吴均（469—520）的《与宋元思书》、以及郦道元（？—527）的《水经注》中的若干部分，皆可以代表当时的游记佳作。到了唐代，除了柳宗元、元结（719—772）、以及赴印度寻求佛经的僧人行纪（如玄奘596—664的《大唐西域记》）以外，也出现了中国现存最早的纪游日记——即李翱（进士798）元和四年（809）撰的《来南录》。但是到了宋代，游记始有大

---

*作者为美国柯罗拉多大学教授。本文曾在杭州召开的中国宋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宣读过。

①见拙著《试论宋代游记》，将刊印于《中国文学：评论，文章，书评》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关于游记客观与主观写法的结合，亦见石英撰《漫谈游记性散文》，《旅游文学》，第一期1983，116－118页。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规模的发展。当时的文人学者，如北宋的欧阳修(1007—1072)、王安石(1021—1086)、苏轼(1037—1101)、黄庭坚（1045—1105）、南宋的陆游、范成大（1126—1193）以及周必大(1126—1204)，都有游记流传。由宋代文人所写的旅行记录的质量与数量来看，可以证明当时游记盛行。此情况必与当时交通系统的发达、官僚人数的增加以及散文本身的发展都有关联。

陈左高先生在《谈宋代日记》一文中将宋代的许多日记分为以下数类：（一）纪游类；（二）纪传类；（三）史料类。① 为了多了解那时的游记，我们可以再进一步把所谓"纪游类"分成"短篇"、"长篇"两种。前者大多数形容一个一两天之内的短途旅行。此种旅游记载大多是偶然的即兴之作。换句话说，文人路过一个闻名的山峰或庙宇附近，如有闲情雅致，他就特地去该处欣赏风景或者考察些古迹。从现存的宋代游记来看，这种旅行日记不但是最短的（通常只有几百字的长短），而且是宋代最流行的游记。在宋人的文集中，此类的著作颇富。其中以王安石至和元年（1054）写的《游褒禅山记》与苏轼元丰七年(1084)撰的《石钟山记》最具代表性。这两篇文章有个共同特征我们必须注意：此即不以记游为重点，而是把记叙与议论结合起来。如《石钟山记》即为一个很好的例子。该文通过对于石钟山名称的研究和考察，同时真切地描写夜里"乘小舟至绝壁下"，终于发现"石钟"一名的来源，不觉问道："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② 苏轼所主张的意见颇明显：对一件事情的有无先必须作充分的研究与考察，才能下正确的结论。还有很多别的宋代短篇游记也是如此夹叙夹议的。

第二种宋代游记就是《长篇》。宋代产生了好几篇长途旅行日记。如陆游的《入蜀记》、范成大的《吴船录》、楼钥（1137—1213）的《北行日录》、程卓（1153—1225）的《使金录》，前二者形容长江沿岸的景物；后二者记述外交使臣自南宋行在临安至金国首都中都（今北京）途中的经验与见闻。宋代长篇游记大部分都是如此：即是作者迁擢赴任（如陆游）、解任还乡（如范成大）、或持节出使（如楼钥及程卓）时写的。当然也有另一种情况，比如欧阳修的《于役志》，即写1036年被贬谪至夷陵（今湖北宜昌县附近）时的行程与生活。

不少古今学者并以《入蜀记》与《吴船录》为宋代最好的游记作品。明代何宇评之曰："陆务观，范石湖皆作记妙手。一有《入蜀记》，一有《吴船录》。载三峡风物，不异丹青图画。"③ 刘操南与平慧善两位先生于他们编的《古代游记选注》一书中的前言里也注意到此二游记说："范成大的《吴船录》、陆游的《入蜀记》……都生动地记叙了沿途的景色，是我国游记文学的名作"。④ 虽然这两篇作品久已如此受到读者与批评家的欣赏与赞扬，但相较之下，其中《入蜀记》似乎受到了较多的注意和重视。最近美国密西根大学的张春树教授已有全本译文问世。⑤ 本文的目的是略论范成大现存的三种游记

①《见大公报》，1963年6月9日。
②《苏东坡集》，《国学基本丛书》本，33卷，317—318页。
③见陈左高撰《石湖三录》，《大公报》1966年4月24日。
④《历代游记选注·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页。
⑤见South China in the Twelfth Century: A Translation of Lu Yu's Travel Diaries, July 3—December 6, 1170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1)。
见《十二世纪的南宋：译陆游一一七〇年七月初三至十二月初六的游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1年）。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揽辔录》、《骖鸾录》、《吴船录》——的内容与特征，并作一些不甚成熟的分析。本人认为如果想了解宋代游记的发展，我们就非详细看看范成大的三录不可。希望拙文能够提供若干有关范成大对宋代游记文学发展史贡献的意见。请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二、范成大生平简述

范成大，字致能，亦曰至能，自号石湖居士。宋平江府吴县（今江苏苏州）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历任司户参军、实录院检讨官、礼部员外郎等职。乾道四年（1168）范氏知处州（今浙江丽水县），均力役、修水利等，使人民受益非浅。二年后，以宰相虞允文(1110－1174)之荐，被命以起居郎借资政殿大学士祈请国信使，出使金国。他奉使金国的缘故有二：求返被金所侵占的宋朝陵寝之土地（即洛阳），且更定宋受金国书的仪式。事情虽然没有成功，回国以后，孝宗与朝廷百官都认为范氏为国效忠。① 后来石湖为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淳熙五年(1178）又迁中大夫除参知政事。

范成大在南宋诗坛上有相当高的地位，与同时的尤袤（1124—1193）、陆游、以及杨万里（1127－1206）齐名，其好友周必大曾说道："文章赡丽清逸，自成一家。尤工诗，大篇短章传播四方②。"晚年告老归隐别墅"石湖"（于吴县盘门西南十几里）时所写的《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绝句是其代表作。范氏所作诗文，早有全集刊本，共一百三十六卷、而今大部已亡佚，现存者《石湖诗集》三十四卷、《石湖词》一卷；另有单行专著《吴郡志》、《桂海虞衡志》、《菊谱》、《梅谱》等。范成大所写的三篇游记（《揽辔录》、《骖鸾录》、《吴船录》）也是单行而传下来的。此三录悉出于陶宗仪（约1316—约1402）编的《说郛》丛书。③

三、石湖三录的内容大要

三录之一，《揽辔录》，一卷是范成大乾道六年（1170）当国信使往返金国所作。"揽辔"二字取自《后汉书》，《范滂传》中所说的"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一语，以名此日记，作者的胸怀昭然可见。④徐梦莘（1126—1207）《三朝北盟会编》和胡三省（1230—1302）《资治通鉴注》都颇引此录。然而多半不见于今传本。陈继儒（1558－1638）于《宝颜堂秘笈》本题跋云："按使金事，于公生平甚伟，其所记不应止此。"由此数语我们可以推测：《揽辔录》一书自明以降已非全帙⑤。但是范氏的日记中泄露了常见正史中所未有的地理、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的描述。因此它甚值得注意，亦值得研究。虽然《揽辔录》的今传本写得很简略，如能和《范石湖集》第十

①见拙著《范成大之〈揽辔录〉考译》，即将刊印于台湾《清华学报》。

②引自湛之编《杨万里范成大卷》（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之中的《资政殿大学士赠银青光禄大夫范公成大神道碑》，121页。

③关于范氏三录各种现存的版本见：程光裕撰《石湖纪行三录考略》，刊于《宋史研究集》第十一辑（台北：国立编译馆，1979年），505－512页，以及拙著《范成大之〈揽辔录〉考译》。

④见《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卷67，第2203页。

⑤见昌彼得著《说郛考》（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年版），256页。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二卷的七十二首纪行诗合读，就可以发现较多的事实。今本全录始于乾道六年闰五月戊子（公元1170年6月24日），终于十月戊子（11月21日）。计十九条。其内容乃对当时南京（即开封）各城门的宋金异名、城内外建筑、金国钞币、老百姓在外族压迫之下的悲惨生活，有较细的描绘。作者对金国中都的建筑形式、宫殿规格、朝廷局面，作了详尽的叙述。因为石湖亲眼看到以前繁荣的北宋首都开封城里是"弥望悉荒墟"，北方女人的衣装"尽为胡矣"，被迫修建中都新殿的汉人"死者不可胜计"，范成大往往不免对金人表露愤激之情。总之，《揽辔录》不特是一篇研究宋金史的可靠而有价值的史料，并且生动地暴露了宋人对当时统治北方的金人的感情。

乾道七年（1171）范成大受命以集英殿修撰知静江府（今桂林）兼广西经略安抚使。其后他自吴县赴帅桂林。其第二本游记《骖鸾录》，就是记他由吴经过浙、赣、湘、桂诸省，抵达静江府的沿途所见。今本全录起于乾道八年十二月七日（公元1172年2月23日）讫翌年三月十日（1173年4月23日）。计八十八条。所谓骖鸾者，系因韩愈（768－824）诗中"远胜登仙去，飞鸾不暇骖"一语而得名。① 《四库全书提要》的编者评此录说："中间序次颇古雅"。②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此作不但比《揽辔录》长几倍，而且其各式各样的题材范围更丰富，如参观湖州（今浙江吴兴县）的"石林"名胜、叙述严州（今浙江建德县附近）杉木重税情形、游览向子諲（1085—约1152）所住的芗林及曾在湖南任职的任沼（生卒年不详）所住过的盘园、批评南岳庙中所保藏的壁画、评论元结（719—772）所写的《中兴颂》等条。读者在阅毕《骖鸾录》后，可能会有"无事不入题"的感觉。诸如风景、经济、政治、历史、文学、艺术，以及其他的各式各样描写都被包涵在内。作者在途中时连"逆旅浆家皆不设圊溷，行客苦之"之事也提到！因为《骖鸾录》中的"序次颇古雅"，内容也很广泛，行程历历如在目前，所以对其后明清二代日记撰写的影响很大。比方，清代张祥河（1785－1862）仿石湖的游记，撰《续骖鸾录》，记他道光二十四年（1844）自中州（此即开封）至粤西（此即桂林）之见闻。虽然张氏所取之道与成大不同，看到的风景亦异，但就风格而论，其日记中的描写与石湖的《骖鸾录》是相似的。③

最后一录，《吴船录》，是范成大最杰出的游记。他在淳熙四年（1177）正月知成都府时，以大病乞归乡。孝宗令进敷文阁直学士。此年夏，石湖自蜀沿长江水程归吴。途中所历，凡山川景物逐日皆有所记，成为《吴船录》一书。书有一卷本，亦有二卷本，分为上下二卷。始于淳熙四年五月二十九日（公元1177年6月27日），终于冬十月三日（10月26日）。计一百零八条。范氏取杜甫（712－770）诗中之"门泊东吴万里船"句，以名此录。④ 《吴船录》的篇幅比《骖鸾录》多一倍。其中百余条的叙述，也较仔细。

①《韩昌黎全集》，《四部备要》本，10卷，16页。

②《合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四库未收书目禁毁书目》（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1291页。

③按明代岳和声曾著《后骖鸾录》一书。见清汪森编《粤西丛载》，卷四。

④见《杜诗引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6年），409页（《绝句六首》之二）；关于范氏取杜诗语，亦见陈振孙（约1190－约1260）编，《直斋书录解题》（台北：广大书局，1979年），740－741页。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四库全书提要》称许之曰："于古迹形胜，言之最悉，亦往往有所考证，如释维业纪乾德二年（964）太祖遣三百僧往西方求舍利贝多叶书路程，为其他说部所未载，颇足以广异闻。又载所见蜀中古画，如伏虎观孙太古画李冰父子像，青城山丈人观孙太古画黄帝及三十二仙真……皆可补黄休复《益州名画记》所未及。又杜甫戎州诗《重碧拈春酒》句，印本拈或作酟，而成大谓叙州有碑本乃作拈字，是亦注杜集者所宜引据也。①"以上所说的"于古迹形胜，言之最悉"一句，正是《吴船录》最精彩之处，因为石湖沿途游览各名胜古迹，如青城山、丈人观、三峡、庐山等风光，所以他对这些名胜的描叙特详。《吴船录》中最常为游记选本所辑录的一段即关于峨眉山的若干章节。山上的寒冷气象、奇花异草、杂花美叶尽收眼底，此段中最佳的一部分应是范氏于山顶上所看到的瞬息万变的佛光之记载。他说："俯视岩腹，有大圆光俨卧平云之上，外晕三重，每重有青、黄、红、绿之色。光之正中，虚明凝湛，观者各自见其形现于虚明之处，毫厘无隐，一如对镜，举手动足，影皆随形，而不见傍人。"②这般活泼的描写，不能不令人觉得石湖"录中有画"。《吴船录》不但宜和《范石湖集》的第十八、十九两卷的一百零六首诗同时阅读，而且应该与陆游的《入蜀记》相对照。《入蜀记》与《吴船录》所载的旅行方向虽然相反，但是所叙的风光大致相同。《入蜀记》从东到西，《吴船录》从西到东，两者皆先详尽而后简略；兼以作者的观点差异，正可以相互印证。

四、石湖三录的特征

石湖三录中最明显的特征是取材范围的广泛。因此，这些著作与前代的游记有点不同。南宋之前的纪行日记似乎比较强调客观的叙述或作者个人的感情与风景的关系。例如谢灵运（385－433）的《游名山志》所现存的一些片段，只是简略地、客观地记录一些景物。又柳宗元游记中主要的部分即将他自己和贬谪到永州的忧怨之情跟当地自然环境融合为一体。在基本上，范成大的三录，便与《游名山志》和《永州八记》一样，因为石湖的游记有时注重写景，也有时注重风景跟抒情的结合。例如他游览湖州的大玲珑山时所云："此山石色微黄而更奇古。一丘悉中空。洞穴十数，皆旁通相贯。故名玲珑。泉声泻壤窦中，窈如深谷。堂前小池石如牛马，陂陁其中。池后山屏上，洗出之石襞积嵌岩，巧怪万状"③。此种描绘全是客观的。于三录中也可找出一些结合景物与抒情的叙述，例如在《揽辔录》中，石湖批评前金主亮（即海陵王）于开封所建筑的秀丽皇城，说其"独崇饰宫阙比旧加壮丽。民间荒残自若。新城（即外城）内大抵皆墟，至有犁为田处，旧城（即里城）内粗布肆皆苟活而已"④。虽然范氏游记面貌大部分都是如此，但不限于描叙景色或表现感情与景物的联系。实际上，他的游记还包括甚多其

①《合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1291－1292页。

②《石湖纪行录》（台北：广文书局，1968年），《吴船录》，34页。此今本是据清代《知不足斋丛书》中之石湖三录印成的。后者是范氏三种游记最精之一个版本。以下注解中所载范成大游记引言的页数皆以此本《石湖纪行录》为据。

③《骖鸾录》，5页。

④《揽辔录》，4页。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他的题材。比方，有关历史、宗教、文学、风俗、艺术、交通、经济、政治、日常生活等题目的章节应有尽有。

一般说来，范成大常用“旁观远眺”或“身入其境”的形容方式来叙述其日记中各种各样的题目。所谓旁观远眺者即作者记载事情或景物时，其自身只是一个旁观者，在记录中也没有直接的作用。此类叙述的目的就是客观地报告途中所见所闻，因此以事实为主。这种记录大部分都是关于景致的。譬如在《吴船录》中石湖形容过巫峡时所云：“滩泷稠险，濆淖洄泆。其危又过夔峡。三十五里至神女庙。庙前滩尤汹怒。十二峰俱在北岸，前后蔽亏，不能足其数。最东一峰，尤奇绝，其顶分两岐，如双玉簪插半霄……峡间陡暗如昏暮，举头仅有天数尺耳。两壁皆是奇山，其可俪十二峰者甚多。烟云映发，应接不暇。如是者百余里，富哉其观山也”① 即为一例。然而除了风景以外，还有很多别的题目也用客观的旁观远眺形容方式。比方，关于宗教的题材，在《揽辔录》中有一个甚好的例子：“三十里至邯郸县（今河北邯郸）。墙外居民以长竿磔白犬，自尻洞其首。别一竿缚茅浸酒揭于上。云女真人用以祭天禳病”。② 由以上二例来看，石湖旁观远眺的纪录始终反映比较真实的情况。就是说，他过巫峡时，并未著笔于个人的感情与该危险行程的关系；记录金人祭狗的宗教仪式时也未对此类异族的风俗表示任何批评。他唯一的目的似乎只是让读者也一睹他沿途的所见所闻。

所谓身入其境者即作者记载事情或景物时，他自己是一个参与者，在叙述中也有若干积极的作用。因此，这种记录法与以上的旁观远眺形容方式是相反的。大抵范成大运用身入其境的写法时，他常兼用客观主观二类的形容方式。无疑地，他的主观意见才是重点所在。譬如，石湖赴帅桂林时，在严州曾以该处的一座浮桥渡江。在下引的章节中，他先客观地、仔细地描绘那座桥与当时的杉木工业和付税制度的关系。但是，到最后的结论，作者的重点才显示出来。其文曰：“浮桥之禁甚严。歙浦（今安徽歙县东南）杉排毕集桥下。要而重征之。商旅大困。有濡滞数月不得过者。余掾歙时颇知其事。休宁（今属安徽省，在歙县西）山中宜杉…出山时，价极贱。抵郡城已抽解不赀。比及严则所征数百倍。严之官吏方曰：‘吾州无利孔。微歙杉不为州矣。’观此言，则商旅之病，何时而瘳？盖一木出山或不值百钱。至浙江，乃卖两千。皆重征与久客费使之”！③

范成大无论用旁观远眺或身入其境的形容方式，无论用客观或主观的论述写法，多半系以既直接又未装饰的语言为主。笔者在上文已列举了不少这种例子，如他描写宋代严州的杉木工业和付税的条件即为一例。然而，在石湖的游记中，他也运用不少其他种类的语言。因此，就语言方面而言，范氏的游记是多样性的。此即石湖三录的第二个特征。虽然其著作富有各类的语言风格，我们可以大别之为四种：（一）议论；（二）典故；（三）幽默；以及（四）急转的联想（英语即“flashback”）。

议论不仅是范成大三录中的一个特征，而且是宋代游记文学的一个共同特色。这个趋向也许表现石湖与其他南宋写游记者都受到苏轼《石钟山记》里的那种先考察后发论

①《吴船录》，63—64页。

②《揽辔录》，8页。

③《骖鸾录》，11页。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的影响。所以，这种语言并不限于游记，而是宋代诗文内容的一个重要部分。范成大发议论时，很少反映到积极的一面。例如《吴船录》所云："杜子美诗：'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黄梅。湛湛长江去，冥冥细雨来。'蜀无梅雨。子美梅熟时，经行偶值雨耳。恐后人便指为梅雨。故辩之"。① 石湖常象这样突然发出消极的辩论，这可能意味着其个人思绪的局限所在。但是他发不积极议论的主要原因似乎不在于此。其终极目的乃在于指出一些关于文学、历史、地名等等的错误。比方，在《骖鸾录》中，石湖到桂林城外的八桂堂以后就说："未至八桂二三里间有小坡横道。高丈余。上有石碑曰：'桂岭'。其实非也。桂岭闻在贺州（今广西贺县）。"② 对读者而言，此等议论既实用，又不失其趣味性。

石湖三录中的典故不多。他用此类语言的目的，不是为了显现他的博闻强记，而是为了取得特别的效果。这个效果与其日记中所描述的事件总有密切的关系。譬如，于《骖鸾录》范氏记载其家的老乳母"自登舟，病喘甚。气息绵惙"，③ 使范成大一家极为忧虑。次日，送行者均要返乡，石湖益加哀伤，遂有"一段凄怆使文通复得梦笔，作后赋"数语。④ 此即其典故所在。文通就是南北朝江淹(444－505)之字，其著名的作品之一是《别赋》。据《南史》的《江淹传》所载，江淹在梦中受赠一五色笔，遂写就无数佳篇名作。十年后，此五色笔又在梦中被收回，江淹的文思枯竭，终于有"江郎才尽"之叹。⑤ 此时范氏心里的悲哀似乎足以促使江淹再寻那枝五色笔来写一篇《后别赋》。在《吴船录》里，石湖也曾运用此等典故："平生所遇中秋佳月似此夕亦有数。况复修南楼故事，老子于此兴复不浅也。"⑥ 所谓老子指庾亮（289－340）与其友人僚属"乘秋夜往共登南楼"之事。⑦ 范氏为了表现其自身于中秋时参观南楼的欢乐"不浅"，遂运用上文有关庾亮的典故，笔者认为这样运用典故，不但会加强作者日记中的叙述，同时也能让读者多了解石湖最深的感情。

三录中的另一种语言型态就是幽默。从今天的立场来看古代文学作品，有时很难决定其里面的"幽默"是有意或无意之为。依本人所了解，我们可以用个较简单的标准来判断它有无幽默在内。这就是反论（英语即paradox）。所有幽默都有此特性。于石湖的游记中，不管他用客观或主观的形容方式，多半显示比较严格的态度。然而也有例外。在三录中，范氏常谈到所谓"好事者"。这意思是指"有闲情逸致的人"，或"对此有兴趣的人"。有时也暗指对某一事物表现热心的人或指"富有钱者"之义。如于《骖鸾录》石湖描写雪川（今浙江吴兴县一带）的破亭败馆时云："雪川特无好事者能厚捐赀"。⑧ 如果把此句跟下文所引《吴船录》中关于荔枝的一段文字作比，读者必能感觉到范氏的幽默态度："试取数百颗，贮以大合，密封之。走介入成都以遗高、朱二

①《吴船录》，3页。
②《骖鸾录》，45页。
③同上，8页。
④同上，9页。
⑤见《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59卷，1451页。
⑥《吴船录》，80页。
⑦《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73卷，1924页。
⑧《骖鸾录》，5页。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使者。亦两夕到。二君回书云，风露之气如新。记之以告好事者。”① 在最末一句，作者并未直说他本人是一个好事者，其用意仿佛是以自身的作为提供好事者一个可仿效的例子。但是，在文中也有点自嘲的意味。上文所谓“反论”即是此意。此与作者平常所持的严格态度恰恰相反。这种幽默不但表现石湖个性的特征之一，并且在他的游记里有个更重要的作用，即减少其文字中常出现的消极评论的效力。因此可以说，幽默在其作品中有平衡的作用。

如果一个人旧地重游，或碰到与其自身经验有关的事情，常会让他联想到从前的游历或经验，有时也能促使他作一个比较。范成大的三录常表现出此特性。正象他在前述有关严州杉木工业的那章节里所说的“余掾歙时颇知其事”。因为石湖的联想往往是忽然暴发的，可以说是急转的联想。比方，在《吴船录》的《中秋节》一则中，范氏记叙南楼的奇妙风景时，忽然开始回忆曰：“向在桂林时默数九年之间，九处见中秋。其间相去或万里，不胜漂泊之叹……今年又忽至此。通计十三年间，十一处见中秋，亦可以谓之游子。然余以病匀骸骨，傥恩皆垂允。自此归田园，带月荷锄，得遂此生矣”。②石湖的游记里，此种表示法是常用的。范氏在《骖鸾录》记录他于湖州参观壮丽的芗林及盘园之后，也突然转到昔日的一件事情：“始余得吴中石湖遂习隐焉。未能经营如意也。翰林周公子允（即周必大），同其兄必达子上（生卒年不详），过之。题其壁曰：‘登临之胜，甲于东南。’余愧骇曰：‘公言重。何乃轻许与如此？’子允曰：‘吾行四方，见园池多矣！如芗林盘园尚乏此天趣。非甲而何？’子上从旁赞之。余非敢以石湖夸；忆子允之言。并记于此。噫！使予有伯恭（即建过乡林的向子湮）之力，子严（即住过盘园的任诏）之才，又得闲数年，则石湖真当不在芗林盘园下耶”？③此类急转的联想与范氏的客观及主观的描写法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这是因为石湖联想的是与其本人的生活经验和感情有密切关系的。在《骖鸾录》中有关乡林及盘园的这段记载似乎不是拿湖州的二名园与石湖的别墅作比，而是间接地表达其告老还乡的意愿。此意愿，在上文有关中秋节的记录里，也看得出来。

五、石湖三录的贡献

范成大对宋代及其后游记文学的发展有多种贡献。这些贡献与上文所论的特征当然有关系。首先我们该注意：他增广了纪行日记的篇幅。比方，其得力之作——《吴船录》——描述一段约一千八百英里的行程，全文多达一万六千七百字左右。如果把柳宗元的《永州八记》、李翱的《来南录》，或欧阳修的《于役志》跟石湖的三录比较，这个趋势就很容易看得出来。在中国游记文学发展史上，此种写旅行日记的新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随着此种新的游记方式的发展，这类著作的内容也相对地扩大了。石湖能增广行纪篇幅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宋代的交通系统发达。不管是出外买卖的商旅、迁职谪徙的官吏、赴京赶考的士子、向山参谒的僧侣，都络绎不绝于途中。旅店驿舍，到处皆是，外出旅行远较往日方便得多。因此常导致一般官僚任职远方的趋势。撰写日记遂成为他们途中的主要活动之一。其次，范氏在扩张日记的篇幅之余，也同时在游记的精神上作了一些革新。最重要的革新是他扩大了游记题材的范围。在其三录里，似乎任何事皆

①《吴船录》，17页。
②同上，80—81页。
③《骖鸾录》，24—25页。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可以入题。这可能是因为宋代以前并未建立一个长期持续的游记文学的传统之故。自南北朝至北宋之间，当然有一些游记相继出现，例如释法显的《佛国记》及李翱的《来南录》。但是这些作品并未能建立任何特定的传统。笔者认为如果有一个传统，我们就应该能够决定其前期的著作如何影响到后期的作者。但就南宋以前长途游记而言，其相互的关系是相当模糊的。换言之，在南宋以前早期的作品对晚期的作品似乎没有明显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纪行文学最早成熟作品中当有石湖三录。第三，范成大在游记文学的精神上赋予了一个“印象性”。读其三录时，很容易感觉到这个特征。所谓印象性的意思就是说，石湖在其记录中所提出的题材似乎不是故意选取的，而只反映在旅途中特别能引发其个人兴趣的景物与事情。范氏主观的议论尤能显现此种特色。在基本上，表示这个印象性的规则很简单：如果石湖对某件事感兴趣，则记录那件事的章节内容往往就比较丰富。当然有些例外，譬如，有时为了“备国史之阙”他仔细地引用于道中所见的善本书的相关章节或所闻的各种异事。① 但是，一般言之，石湖游记的内容明显地表现作者的历史意识、文学趣味、宗教关心、或自身的偏爱。结果，从其游记中的内容我们可以熟悉了解一个宋代文人最基本的思想与感情。因此可以说，在范氏的手里，游记文学走向一个新的方向。最后，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范成大创造了古代中国旅行日记的典型。本文所谈的“客观与主观”的形容写法，“旁观远眺”与“身入其境”的叙记方式，以及三录里其他的特征，都表现于南宋以后诸作者的游记中。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其游记对后来撰写纪行日记作者的影响很广泛。只要阅读南宋程卓仿《揽辔录》的《使金录》，明代李日华（1565－1635）效《吴船录》的《蕙召录》，清代张祥河继《骖鸾录》的《续骖鸾录》，就知范氏奠立了古代纪行日记的典型。本人认为范成大对中国游记文学发展史最重要的贡献即在此于。

六、结　论

以上所论即范成大三种游记的主要特性及其对宋代与后来纪行文学发展史的若干贡献。这些特性与贡献对明清二代撰写旅行日记者影响至钜，是无庸置疑的。但论石湖三录之文学价值时，有一件事情应该注意到：即表现于范氏游记里的多种革新，有时在陆游的《入蜀记》中，也看得出来。比方，《入蜀记》是现存最长的宋代纪行作品之一，故而可以说，陆游也增广了游记的篇幅。并且，其新鲜活泼的笔调、记事议论的叙述、写景抒情的形容，皆不在石湖三录之下。因此，如果要多了解南宋游记发展的概况，非比较综论此二人的著作不可。然而，笔者认为在作比较综论之前，个别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本文先就范成大与其纪行日记作一析论，以备来日进一步研究之需。

虽然范成大的“三录”或陆游的《入蜀记》，语言优美，而不时夹入议论与感想，信笔所至，有时显得驳杂。这是因为其中有一些关于史实记载或引用其他文学著作的错误所致，似足以表明此文体的规则不如其他文体严格。也许正因此故，在石湖的游记中，常呈现多种语言形式与各样的题材内容。上述所论的印象性即为此特征的结果。此多样性遂使其三录与《入蜀记》成为一种独特的散文体裁。此外，其纪行日记的描述常出乎正史记载之外，可以补一般史料之不足，这也是它价值所在。

最后，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范成大与其好友陆游共同发展了一种有价值、有趣味的文体。这些作品实有助于我们熟悉了解十二世纪日常生活的概况。因此，就研究宋代历史的学者而言，“三录”与《入蜀记》皆是值得注意的佳作。

①见《吴船录》，39页。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